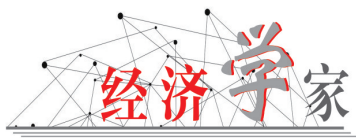




资本『脱实向虚』应标本兼治



王 东 京

后来我又问过几位相熟的企业家，回答也大同小异。于是我突发联想：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读者应该还记得，当年奥巴马上台后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美国要回归制造业”；而特朗普主政期间更是大手笔减税，希望利诱制造业回流。可结果呢？我们今天仍看不到美国有回归制造业的明显迹象。

可转念再想，我又有了一种担忧：中国是否也会因为制造业后继无人而出现产业空心化？并非杞人忧天。国内学界前几年就在讨论资本“脱实向虚”问题，中央也高度重视，说明我们也存在“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我曾撰文分析过：资本“脱实向虚”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

是的，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我还要告诉读者，部门利润率存在差异并非始于今天。早在3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比较英国农民与手工业者、船员收入后曾说过：“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劳动力将会依次从农业部门，逐渐向工业部门与商业部门转移。

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用40多个国家近百年的数据作验证，并证明配第的推断是对的。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为何投资农业的利润率会低于投资工业？而投资工业的利润率又低于投资商业呢？我想到的答案，是产品的“稀缺度”不同。供求原理讲：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会上涨；供过于求的商品，价格会下跌。

在配第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尚未到来，那时工业品供给相对于农产品，无疑更稀缺；而商贸服务相对于工业品，稀缺度也更高。根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在全社会商品中，某类商品的稀缺度越高，相对价格会越高；相对价格越高，利润率也就越高。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行业利润率为何会有差异了。

上面分析的是300多年前的情形。今非昔比，工业革命迄今已有200多年。从全球市场看，工业品已不再稀缺，反而供给过剩已成为普遍的难题；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强调回归制造业，表明实体经济相对于商贸服务业也已显得稀缺。既如此，资本为何还是对虚拟经济情有独钟呢？难道供求规律已经失灵？

这些日子我反复思考，思来想去，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回到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精辟论述。让我们看马克思是怎样分析的。

关于虚拟经济的界定。马克思指出，劳动可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价值），属于实体经济部门；非生产性劳动不直接创造财富（价值），属于虚拟经济部门。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延伸虽不创造财富（价值），但通过提供资金融通、商品流通等服务，可以协助实体经济提高财富生产效率。

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发展必须依托于实体经济，若脱离实体经济自行膨胀，必形成经济泡沫，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而要抑制虚拟资本膨胀，前提是全社会利润率要平均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利润平均化需满足两个条件：部门间可以自由竞争；资本在不同部门能够自由流动。

现在看，中国的现实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国内资本“脱实向虚”，的确是虚拟经济利润相对高所造成的结果。据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率为6.84%，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率却高达16.27%。金融业利润率之所以比制造业利润率高，原因是政府对金融业牌照有严格管制，资本难以自由进入。也就是说，目前金融业利润中，有一部分是“行政租”。

问题就在这里：虚拟经济部门不创造财富（价值），但却参与财富（价值）分配。当财富（价值）一定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收益则相互消长：虚拟经济的收益高，实体经济的收益就会低。另外从投资选择看，虚拟经济收益越高，投资实体经济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前面说到制造业后继乏人，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要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局面，必须标本兼治。治本的办法，当然是打破行政性经营垄断。可此举涉及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远水难解近渴，眼前还得有治标的办法。我的建议，可考虑在税收政策上再作调整，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减税力度。

我国的结构性减税，可圈可点。2016年国家启动“营改增”试点，制造业适用税率为16%，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为11%，金融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为6%。2019年，制造业适用税率调减至13%；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减至10%。为支持实体经济，国家何不将制造业适用税率也减至10%？“拉弗曲线”读者都知道，道理就不用我说了吧。

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 郑 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大力提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杜绝各种金融乱象，规范金融经营和监管，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立足“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精准识别和防范增量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的前提。对内外部可能出现的不同金融风险，我们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做到严格监控，有效防范，精准识别和预判，不忽视任何一种增量风险，不放过任何一个风险隐患。

紧抓“防”。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做到准确判断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从政治上发现问题、从全局上分析问题、从系统上解决问题，做到如履薄冰、防微杜渐、严防死守，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

守得“准”。强化化解金融风险“时、度、效”，持续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供给配置效率，促进金融体系内部、金融和实体之间良性高效循环，以高质量发展反向促进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答好有序化解金融风险的考卷。

践行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党在长期实践

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给我们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思想源泉。

运用系统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战略思想都贯穿了深刻丰富的系统思维，为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方法论。

注重顶层设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运行也暴露出各种矛盾和风险，并不断传导和体现于金融领域。避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必须着眼于全局、全盘、全系统，方能做到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坚持守正创新。准确把握金融风险所具有的隐蔽性、关联性、复杂性、叠加性、传导性特征，需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掌握整体风险，抓住要害风险，兼顾关联风险，积极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这就要求我们从政治大局出发，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建立起防范化解金融的长效机制。

坚持市场化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全面风险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工作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坚持法治化原则。统筹结构调整，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主动防范和稳妥化解风险，发扬恪尽职守、敢于监督、精于监督、严格问责精神，提高金融治理能力水平。总之，既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又要避免只关注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而忽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避免只注重发展而忽视金融风险累积、叠

加，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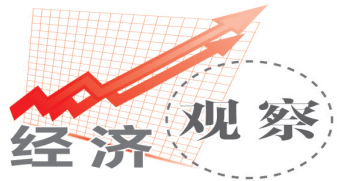
练就防范“头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应对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勇于直面问题、正视困难，提高应对一系列新风险挑战的能力。

克服“好人主义”。总体看，我国内部金融风险主要来自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风险，以及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的风险。面对内部金融风险，金融机构要坚定立场，不做“老好人”，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坚决遏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和健全金融法治，做到有的放矢，严格把控，积极“排雷”，精准“拆弹”。

严防外部风险输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持续深入开放，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加大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的风险外溢防控压力。为此，我们必须准确研判外部风险来源，切断传导路径，严防风险输入。同时，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密切关注和预判主要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特别是着眼于未来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一些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可能引起跨境资本从我国抽离，对我国金融和资本市场产生的风险隐患。

防止“跑冒滴漏”。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和传染性使得金融机构必须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做到既积极推动经济去杠杆、遵守严监管，又坚持守正创新、优化金融服务模式、增强金融驱动效能，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作者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次浪潮。中国入世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入世20年来，中国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向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

中国与世界实现联动发展。入世使中国出口商品享受平等的成员待遇和各项贸易便利化举措，由此所带来的开放红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等方面，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长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0年中国首次成为外资流入第一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把自己发展好，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投资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和丰厚的投资回报，同时，近年来中国积极扩大对外投资，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共赢发展。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市场机遇和发展机遇，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进口国、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口对象国遍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和地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低迷，市场成为宝贵而稀缺的资源，中国则主动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扩大出口，创设了诸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产品进口免关税待遇，帮助其他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与世界规则积极对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全面积极兑现



入世承诺，大幅降低、削减商品进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中国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下调至7.4%，远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并于2010年就完成了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承诺。中国认真履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裁决，认真对待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工作。入世20年来，中国积极对标多边贸易规则来调整法律法规，规则透明度显著提升，不断放宽外资准入，广泛而有序开放服务业，开放层次不断加深，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制度型开放，不断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开放程度又有实质性提升，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取得明显改善。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系，成为多边主义的积极贡献者。另外，中国共同发起《环境产品协定》，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谈判，等等。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为经贸规则重构进行了重要探索，也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明显放缓，部分产业的国际分工环节非但没有继续扩张，甚至有所倒退，全球价值链正经历深刻

变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各个国家普遍更加重视产业安全，一些国家试图自建产业链，推动海外制造业回归，并激励新增投资更多地配置在本土或本土周边，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区域化、碎片化趋势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势和历史潮流，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承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引领经济全球化“逆流而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维护者和引领者，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

创造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动能。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也能提振投资信心，刺激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的发展，从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全球需求不振，跨境投资信心不强，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面临发展赤字。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发动机，特别是2006年以来，中国历年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位居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适应经济

从全面融入到积极引领

——中国入世二十年全球化定位

□ 郝身永 王丹阳

发展阶段转换的客观规律，中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成为稳定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基本盘”。在推动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主张并积极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各国联动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济根源，中国主张建设开放包容型全球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期，中国积极推动各国加大创新投入，改革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潜能，培育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区域合作，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相继签署了一批双边自贸协定，与东盟等国家一起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政策与发展战略对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全

球化的发展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从历史经验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继起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通过削减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方式，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一直不断演变，另外全球产业链网络也一直在不断调整，全球化的治理也必须与时俱进。当前，世贸组织的有效性和权威有所削弱，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等国家奉行单边主义，破坏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世贸组织本身也需要在多边谈判决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中国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的转型与改革提出中国方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首先，中国坚定地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世贸组织的多边主义基石地位，维护世贸组织的核心规则，同时为世贸组织的改革提出建设性的“中国方案”，比如，针对全体协商一致决策机制提出了务实的开放式诸边谈判机制。其次，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东升西降”的重大变化，但全球治理体系并未及时反映这种变化，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中国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权，通过金砖国家峰会、G20峰会等平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声，有力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再次，中国主动承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包括推动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尤其是发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搭建了双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相关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五通”为主要内容，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取得了重要进展。

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治理有关，也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涉及各种交易成本、时间成本、通关成本、物流成本等，这些成本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历史看，造船技术、集装箱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交通科技等发展都曾有力地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蓬勃发展，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提供了全新动力，也推动了国际贸易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其中，以数字贸易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最为迅猛，这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上有互联网用户规模、数据等优势，利用这些优势，中国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同时，积极完善新型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底层支撑。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相关国际规则、规制、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涉及数字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源代码公开、个人隐私保护、数据知识产权的确权与交易等，中国积极推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的标准和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实现良性治理和有序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动力。